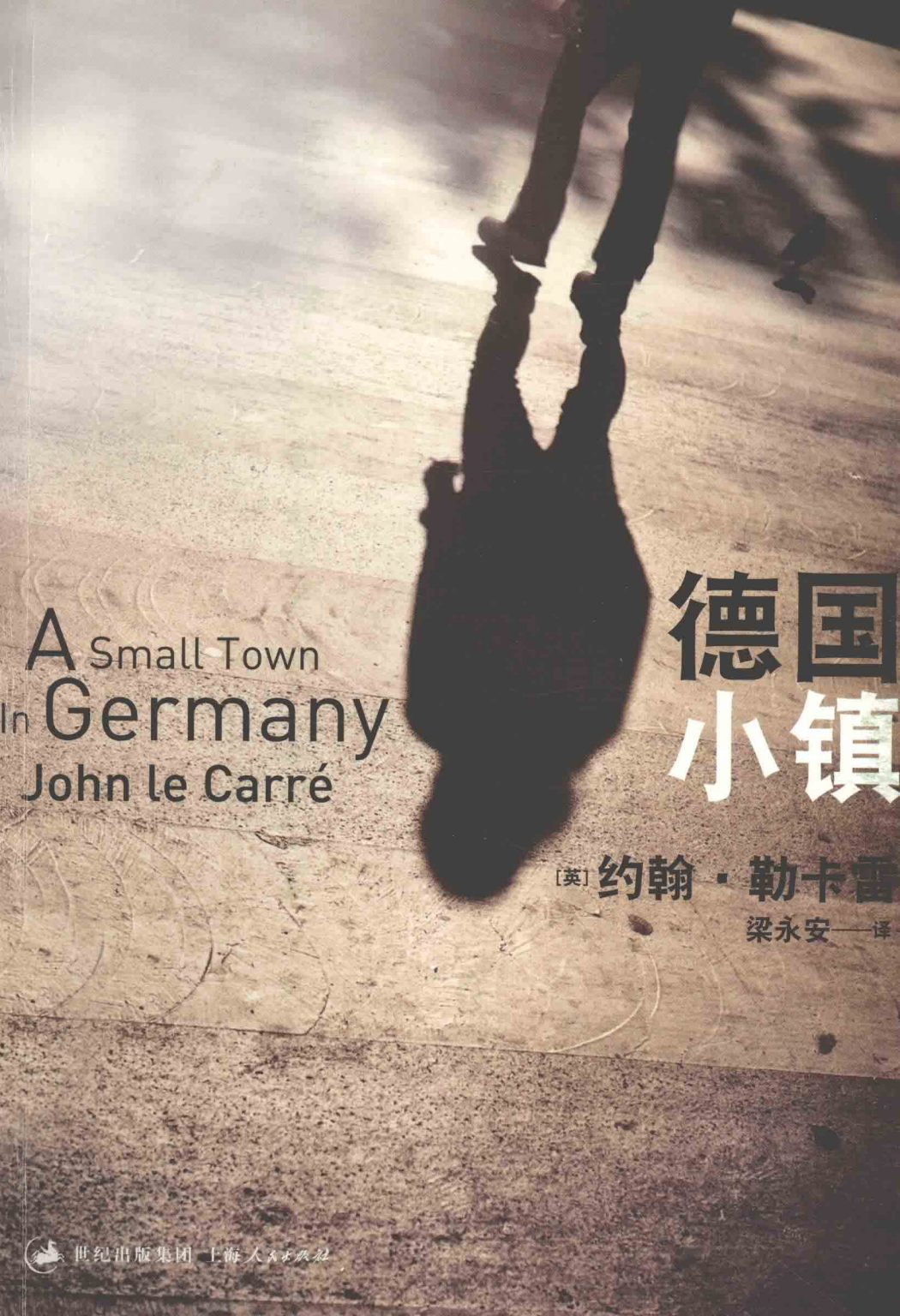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John le Carré

德国 小镇

[英] 约翰·勒卡雷

梁永安——译

德国 小镇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John le Carré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梁永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小镇 / (英) 勒卡雷著; 梁永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ISBN 978-7-208-10151-7

I. ①德… II. ①勒…②梁… III. ①间谍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363 号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邵艳美

装帧设计 蔡南升

版式设计 尚燕平



德国小镇

[英] 约翰·勒卡雷 著

梁永安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151-7/I·924

定价 35.00元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 1961 《召唤死者》
- 1962 《优质杀手》
- 1963 《柏林谍影》
- 1965 《镜子战争》
- 1968 《德国小镇》
- 1971 《天真善感的爱人》
- 1974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1977 《荣誉学生》
- 1979 《史迈利的人马》
- 1983 《女鼓手》
- 1986 《完美的间谍》
- 1989 《俄罗斯大厦》
- 1990 《神秘朝圣者》
- 1993 《夜班经理》
- 1995 《变调的游戏》
- 1996 《谎言定制店》
- 1999 《辛格公司》
- 2002 《永恒的园丁》
- 2004 《挚友》
- 2006 《伦敦口译员》
- 2008 《头号要犯》
- 2010 《我们这样的叛徒》

〔自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怀有恶感，也想不出能为它说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阿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想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1]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

[1] Adenaue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第一任总理。——译者注，下略

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锵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

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1]那些秘密会议室里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2]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

[1] Whitehall，英国的政府部会。

[2] Chequers，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

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1]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1] Harold Macmillan，英国首相。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1]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

[1] 此处指波恩。

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们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1]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2]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

[1] Danny the Red, 1968年巴黎五月学运的领导人。

[2] Baader-Meinhof, 1970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团。

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角落上的桌子边，一边细口喝啤酒，一边看着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

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衫，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

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和我那可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座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的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勒卡雷

1991年3月

「前言」 猎人与猎物

再过十分钟就是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透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着。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着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顶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逃得远远的。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徕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只只杏仁蛋白糖果猪像被拔了毛的老鼠兀自守护着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1]。

[1] 圣徒节日为天主教的圣徒纪念日，通常是一个圣徒的逝世忌日。杏仁蛋白软糖猪是猪造型的大型杏仁蛋白糖果，为圣徒节日的应景食品。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是贴在同一高度，仿佛这是规定。它们全都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着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地迎过来。“让外国劳工滚回去！”“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踩着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时而会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于街灯之下。

这个夜晚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昼走得毫无征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室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凶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着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着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

“世界属于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1]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张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脚步。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俨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踪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这种权威感却让他越来越难过。他是被前头看到的東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宛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位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边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次是一些不尽属实的广告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穆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凶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锲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

[1] Alex Springer，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出版集团的老板。

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费尔德要在汉诺威讲演！”“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钟开始单调地鸣响着，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看。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嵌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钟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钟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当当当声。是祈祷钟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着。教堂毗邻着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刹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陡地响彻整条空荡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湿滑的电车轨上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